

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

田文林

[内容提要]突尼斯政局动荡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连锁效应,并使不少国家陷入政权危机,主要源于这些国家多年来治国理政失误带来的重重积弊。其中主要有三大根源:一是政权阶级基础转向导致当权者逐渐脱离民众;二是发展模式弊端使阿拉伯国家日趋陷入“全球化陷阱”;三是亲西方外交恶化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外生存环境。长远看,阿拉伯世界现行模式难以维系,深度变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 变局 根源

[作者简介]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和第三世界政治研究。

当前,中东国家维系多年的统治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11年初,一向以稳定繁荣著称的突尼斯爆发全国骚乱,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政权猝然垮台。此后,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迅速扩散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中东搅得周天寒彻。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利比亚、巴林等国相继爆发民众骚乱或抗议示威,连续执政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苦苦抗争18天后黯然离职,执政超过41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以及执政30多年的也门萨利赫政府,地位同样岌岌可危。这场风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烈度之强,出乎许多人意料。中东正经历着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始于今日,但导致这一变局的症结早已存在。阿拉伯世界在此之前就已陷入总体性失败处境,如政治专制、经济衰退、食品短缺、人口爆炸、思想禁锢等等,以致被称为“世界病夫”。按理说,阿拉伯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发展资金充裕,同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实现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十分优厚,而且阿拉伯民族历史上也曾创造过辉煌,为何国家治理却积弊丛生,乃至爆发全面危机?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汲取其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东乱局,而且对战略决策也不无借鉴意义。

政治的本质即“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¹ 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毫无疑问,政权的阶级基础越厚实,政权就越稳定,反之亦然。60多年来,中东共发生过两轮政治更替大潮:第一轮是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军人政变推翻代表封建势力和少数权贵的君主制统治,如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1958年主张民族主义的卡塞姆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1969年卡扎菲政变推翻利比亚伊德里斯王朝等等;第二轮是70-90年代,民众以“伊斯兰复兴”的形式反抗当权者,并在伊朗成功夺权,在苏丹、阿富汗、阿尔及利亚也一度掌权或险些掌权。而当前,历史在重演,中东掀起新一波民众反抗当权者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中东这种“翻烙饼”式的政治更替,其共性特征是当权者的统治日渐背离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就拿此次政局最动荡的埃及、利比亚等国来说,当初这些

¹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上台的领导人,主要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在执政初期,大都能励精图治,在土地改革、社会福利等方面均采取了有利于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对外领域,这些国家大都敢于对抗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主张维护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甚至一度将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列为政策目标。然而,即使是这些政权中政治最先进的国家,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统治,而小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它总是谋求跨入其他社会阶层,其意识形态也总在不断变化。¹“他们既讨厌又羡慕有钱人,而自己对穷人往往不是以恩人自居,就是表示轻蔑。”^④换言之,这类政权的内外政策先天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长远看,这类政权会向不同方向变化。

大体上说,这类政权主要有两条政治路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下看”,拓宽政治参与和执政基础,向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发展,政策纲领切实体现多数民众的意愿;另一种是“向上看”,由最初服务于中下层民众的小资产阶级专政,转为服务于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从实践看,显然后一种情况居多。“随着时间推移,任何由小集团掌权的政权,都会利用手中职权,使自己先富起来。”^⑤“这一点都不奇怪。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在‘普力夺社会’(即军人政权),政治家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造反者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或‘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⑥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学者指出,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国家机器自身是由小资产阶级‘精英’组成的。……在一段时间内,它需要获得工人的支持,因而采取再分配政策,高喊社会主义口号,但它迟早要屈从于个人发财致富的诉求,最终打破与劳动阶层的联盟,成为剥削劳动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⑦继任的萨达特内外政策的转向,就是这种阶级属性转变的具体体现。伊拉克也是如此。在1968年复兴党刚上台时,其内外政策均能励精图治,社会经济政策明显维护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并使该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到萨达姆时期,“党天下”俨然成了“家天下”,其

内外政策日趋极端化。如伊拉克1980年出兵伊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弱点,即“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⑧

这些政权阶级基础的转向,引发了一系列严峻问题。最明显的是威权统治的优势逐渐成了劣势,国家公器日趋成为个人私授的财产和工具。中东国家大都实行威权统治,这种模式本来就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达到民主政体难以企及的调配资源能力。但其本身也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如因权力缺乏监督而容易出现独裁、权钱交易问题等等。因此,一旦当权者脱离民众基础,政权服务对象由多数民众转向少数精英,这种政体的优势马上就变成了劣势——国家权力很容易成为少数当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

最明显的是权力观发生改变。在中东,不少当权者贪恋权位,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均已超过30年;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执政41年,但仍无让位迹象,甚至有意让其子接班。在中东,“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很少例外。选举仅是个笑话”。^⑨与此同时,权力日渐被用于谋求个人私利,而“改革”往往成为当权者借机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迅速实现致富的不二选择,其最终结果就是“改革使改革者先富起来”。据维基解密文件称,在突尼斯,只要是本·阿里家族看上的,无论是现金、土地、房屋甚至游艇,最终都得落入他们手中,该家族总资产达35亿英镑⁽¹⁾;另据报

¹ Alan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90 pp 413-414.

^④ [英]狄利普·希罗著,赵炳权等译:《中东内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

^⑤ George Friedman “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 <http://www.stratfor.com/weekly/20110221-revolution-and-muslim-world>, February 22, 2011.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9页。

^⑦ Alan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 410

^⑧ [英]彼得·高恩著,顾薇、金芳译:《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⑨ Walknawir “Arab development Self- doomed to failure”, *The Economist*, Jul 4th 2002

⁽¹⁾ “突尼斯骚乱依然持续,前第一夫人被曝大肆敛财”, <http://cankaoxiaoxi.tietai.com/a/junshijiyu/2011/0118/23564.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道,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八子一女,分别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基础设施等产业,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据估计,每年有数百亿美元流入他们的私人腰包。¹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家族的资产据称达到了400亿-700亿美元。^④同时,在这些当权者周围,日渐形成一个由亲信和高官组成的特权阶层。若干年前,一位埃及著名知识分子就将这一特权阶层称为“伞兵阶级”。他说,伞兵的任务是夺取或摧毁他们所降落的阵地,而这个新阶级也是下决心逐步控制或摧毁埃及。^⑤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层的巧取豪夺,使腐败日趋成为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常态。据统计,阿拉伯世界1/3的GDP被腐败吞噬。在“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国家排名中,埃及、黎巴嫩、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名列前茅。^⑦“腐败已成为该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裙带主义到直接受贿,国家高度介入经济生活,为公职人员腐败提供了充分的机会。”^⑧如埃及贫富分化加剧,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⑨只要与政府公职人员打交道,不管是申请驾照还是出租房屋,都要行贿。^⑩当政者日渐背叛最初的阶级属性,由矢志清除腐败和无效率问题的社会进步力量,变成腐败政治的维护者,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样,社会财富由本该“往下淌”变成了“往上流”,日趋集中到少数当权者手中,由此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大。据统计,在阿拉伯世界,5%的人支配80%的财富;在埃及,20%的富人占有社会财富的55%,而60%的穷人的社会财富拥有量只有18%。^⑪普通民众“被剥夺感”十分强烈。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阿拉伯国家的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其政权维系统治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因此,这些政权因日趋服务于少数权贵,缺乏足够的“实质合法性”,难以赢得左翼和中下层民众的真心支持;同时,又因为家族世袭或终身执政,缺乏足够的“程序合法性”,难以赢得西式民主派认可。在这些当权者周围的支持者中,除了少数特权集团和既

得利益者外,剩下的几乎都是反对派:穷人憎恨富人豪华奢侈,平民憎恨权贵巧取豪夺,教士憎恨世俗化带来声色犬马,民主派憎恨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权贵统治几乎总是自动为自己培养掘墓人和反对者。而在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动荡冲击波中,就出现了“昔日革命者被再次革命”的怪现象。

二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过程,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结果只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第三世界国家被纳入全球化体系,本质上有利于西方资本家(一定程度上包括本国资本家)扩大剥削范围,由此构成“两大剥削与被剥削的同心圆”:一个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另一个是发达国家内部及第三世界内部的剥削与被剥削。这两大“同心圆”同样会强化“资本主义绝对规律”,即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然而,相较而言,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阶级还可以通过本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剥削获得的巨额利润中获得部分转移支付(各种福利补贴),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⑫使发达国家本来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下

¹ “卡扎菲八子一女掌控利比亚经济命脉”, http://chi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2/97/86/2_1.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④ 刘长锋:“‘阿拉伯革命’其实是一场反腐革命”, <http://www.yslze.com/news/Class149/201102/20110218143234.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⑤ [埃]穆罕默德·海卡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⑥ [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吕应中等译:《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⑦ 安国章:“阿拉伯世界三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被腐败吞噬”, http://intl.ce.cn/gjzx/africa/201007/07/t20100707_21588027.s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⑧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 Byn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Rand Corporation, 2004, p. 23

^⑨ Robert Fisk “The rotten state of Egypt is too powerless and corrupt to act”, *Independent*, 1 January 2009

^⑩ Maged Sakmah, “Corruption in Egypt”, <http://democraticegypt.blogspot.com/2006/04/corruption-in-egypt.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⑪ “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两成富人拥有八成五社会财富”, http://news.tin.edu.cn/2011-01/27/content_1136139.htm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⑫ 参见[英]帕姆·杜德著,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

去,而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就不这么幸运了。这些国家的劳动阶层处于世界经济链条的最末端,他们遭受着西方资本家、本国权贵的双重剥削,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却最为艰辛,随时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这种“劳动异化”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奉行“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可以维系现行模式,而第三世界却不行。

但很多阿拉伯国家没有意识到这种貌似公平的“全球化”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和残酷性,盲目追随,结果日趋被纳入这种“主从型”经济结构,导致落后状态日益固定化。这种状态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开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欧国家成为‘世界工场’,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应继续成为或变成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奥斯曼帝国对这种安排也没有反对意见,原因是在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¹而许多阿拉伯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后,当权者仍是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封建特权阶层,他们与西方之间“有一种固有的机制,几乎是自动地引导殖民国家本身与特权集团结盟”,^④因此,其经济上仍遵循西方设定的“比较优势分工”,靠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生。中东丰富的石油储量及由此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无疑强化了这一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据统计,到2007年时,阿拉伯世界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四)

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阿拉伯世界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多数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产,即使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因此,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石油生产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相反,阿拉伯国家越是参与全球竞争和利益分配,本国的财富就越是日趋流向发达国家,而本国的实体经济则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走上衰退道路。据统计,1980—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4}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

水平与1970年时相当。^{1/2}目前阿拉伯世界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3/4}约旦约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4%;也门2300万人口中近半数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的人长期挨饿。^⑧

众所周知,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世界最高,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而本国工业不发达,国家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不足⁽⁴⁾,致使年轻人失业及“青年膨胀”(Youth bulge)等问题突出。^④在埃及,占总人口70%的年轻人面临高失业问题,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¹⁰阿尔及利亚3/4的人在30岁以下,许多年轻人没有工作,全国失业率高达25%。与安贫乐道、观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阿拉伯新生代视野宽,束缚少,易被煽动和组织,加上谋生无路,因此不满现状、谋变的愿望最为强烈。亨廷顿就认为,游民无产阶级和青年学生是革命性最强的群体。¹¹日益膨胀的青年失业大军成为威胁政局稳定的“火药桶”,突尼斯“革命”就源于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埃及、也门等国的反政府抗议,也都是年轻人担当主力军。

埃及是最典型的例证。在纳赛尔时期,埃及一

¹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3—214页。

^④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487页。

^(四)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1/4}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1/2} 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 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p. 61.

^{3/4} Shawn Bakwin, “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 Bread Corrup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08.

^⑧ “阿拉伯‘革命年’:经济是主因”, <http://roll.sohu.com/20110220/n303371945.shtml> (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⁴⁾ Peter Coy, “The Youth Unemployment Bomb”, *Businessweek*, February 2, 2011.

^④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http://www.arab-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¹⁰ J. Scott Carpenter and David Schenker, “Will Egypt’s ‘Day of Rage’ Become a Revolution?”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295>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¹¹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54页。

度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但萨达特时期推行的“开放政策”使外资大批涌入,民族工业纷纷倒闭,摆脱经济依附的梦想功亏一篑。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但到1979年时,它所需食品的一半以上要靠外国进口。1970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40%供出口,到了1980年,埃及非但不再出口食糖,还成了食糖进口国,进口量达到消费量的35%。由于食糖消费量激增,当时埃及主要财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净收入,竟不足以支付进口食糖的费用。¹穆巴拉克时期延续了这种政策,并加大自由化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埃镑自由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而银行私有化使埃及半数以上银行从国有变为私有。^④私有化不仅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而且埃及的自由化改革使国际资本大举进入,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近些年,埃及经济年均增长7%,甚至在2008年全球经济萧条下仍业绩不俗。^⑤但实际上,该国经济“有增长无发展”,埃及政府至今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因此早在2010年9月,美国学者就公开撰文称埃及是“尼罗河病夫”。^⑥

为维系政权稳定,阿拉伯多数国家被迫长期实行补贴政策,“以面包换稳定”、“以福利换支持”。但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粮价上涨,使经济最为脆弱的阿拉伯非产油国率先受到冲击,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现行维稳模式陷入两难:如果继续补贴,经济上吃不消;但取消补贴,政治上又吃不消。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均曾因取消补贴引发骚乱。阿拉伯统治者已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三

在外交领域,当政者究竟该奉行“群众路线”,主要依靠本国民众,还是走“精英路线”?依靠少数精英和外部力量,不仅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和外交战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定程度。大体来说,“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⑦这实际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原理,即“人民是历史

的真正创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于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的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在这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教训明显多于经验。在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都将亲西方列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几年前,开罗美国大学的伊斯兰学教授赛拉格曾指出:“所有阿拉伯国家都热衷于同美国结盟,听到布什总统对他们说句赞扬的话,立即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因为他们的政权须要依靠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他们都处在国民的对抗和包围之中。”^⑧正是由于这些国家依靠少数精英和西方势力,使反美情绪普遍强烈的阿拉伯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由此导致国家上下离心,威胁政权稳定的基础。

在这方面,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国家,其经历最具典型性。20世纪50-60年代,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老一代阿拉伯领导人,注重依托本国民众和阿拉伯世界,英勇抗击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不仅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而且成功抵抗了英、法、以三国的联合军事入侵,因而在国际上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的国际威望也达到峰值。但从萨达特执政开始,埃及逐渐转向“精英路线”,重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1972年7月,埃及驱逐数千名苏联顾问,明确“亲美疏苏”政策;1979年,埃及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而将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及其反以统一战线完全抛弃,这种做法使其失去了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及相当部分国内民众的支持。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后,本国民众反应淡漠,这与当年纳赛尔去世时万人送葬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而穆巴拉克继任后基本沿袭了萨达特的

¹ [埃]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第243-244页。

^④ Philip Rizk “Egypt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 <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opinion/2011/02/201102148356117884.htm>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⑤ David Schenker “Sick Man on the Nile”,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blogs/sick-man-nile>, September 2, 2010.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⑥ David Schenker “Sick Man on the Nile”,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blogs/sick-man-nile>, September 2, 2010.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⑦ [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⑧ “中东领袖们背弃伊斯兰”, <http://www.norislam.com/viewnews-2745>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外交路线,热衷于充当阿以之间的“润滑剂”,以及美国维护中东战略利益的“垫脚石”,并成为美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

回过头看,埃及这种以放弃阿拉伯世界团结为代价的亲美亲以政策,实际使其成为“猎鹿博弈”中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捕捉野兔的猎人。从短期看,这种做法使埃及从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奈半岛,并在一定时期能够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桥梁,成为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享受“和平红利”的阿拉伯国家。但长远看,这种做法完全得不偿失。一方面,亲西方外交使其日趋失掉国内民众的支持,乃至丢掉性命。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国家丧失了共同前行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威望日渐下滑。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阿拉伯国家政府受到了比贫穷和独裁更具破坏性的诅咒。它们成了‘废品’,被自己的人民视为异类,推行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政策。”¹另一方面,讨好西方使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独立性,日渐沦为美国的附庸,自身地缘环境也日趋恶化。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后,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分裂,“实际上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了”。^④埃及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被根本改变。事实上,这种分裂明显增加了中东被外来大国干涉的可能性,而最终损害了埃及的国内外生存环境。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美国利用“9·11事件”,先后在大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地区战争,矛头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而以色列因缺少了埃及等国的有力制衡,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炫耀武力更加肆无忌惮。2006年,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9年底至2010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马斯发射火箭弹,而对加沙地带发动“铸铅行动”,再次造成数千人伤亡。面对阿拉伯世界权益和尊严不断遭受侵害的严峻挑战,许多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其表现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

其总理埃尔多安,这种巨大反差使阿拉伯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日趋加剧。

在这轮阿拉伯乱局中,越是亲美的国家,动荡越严重,反美国家则相对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民众起义暴露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依靠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充当西方应声虫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策略只会令这些政府丧失信誉。”^(四)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也认为,埃及和突尼斯的局势动荡,不是因为经济形势,而是政府与敌人合作,使民众遭受了几十年的羞辱。叙利亚媒体认为,埃及国内发生的革命源自其失败的外交政策,而叙利亚正是由于坚持反美政策,国内政局才得以稳定。^⑤

值得提及的是,一直被这些国家奉为靠山的西方大国,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将这些亲美领导人无情抛弃。如突尼斯一直被视为阿拉伯国家少有的西方盟友,本·阿里尤其与法国过从甚密,其大笔存款也放在法国,但当其一旦失势,法国翻脸不认人,拒绝予以庇护。埃及穆巴拉克的处境也极为不妙。埃及这些年来一直为美国充当制衡伊朗、哈马斯等中东激进势力的战略支柱。但此次穆巴拉克处境岌岌可危,亟需美国援手时,美国却态度暧昧,甚至站在抗议者一边“拉偏架”,宣称埃及“现在”应该进行政治转型。据报道,美国还曾鼓动埃及军队废黜穆巴拉克,尤其是敦促穆巴拉克不能“动粗”,更是无形中捆住了他的手脚,使其像当年伊朗巴列维国王一样最终垮台。当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花了大力气经营与西方的关系,但关键时刻西方盟友却弃之如敝屣。西方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无疑加速了阿拉伯威权政权的垮台,同时也值得其他亲美领导人警醒:一厢情愿地指望通过交好乃至讨好西方来改善自身生存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效果适得其反。

¹ Hussein Agha Robert Malley “The Arab world was dead In Egypt its reborn”, *The Washington Post*, 13 Feb. 2011.

^④ [埃]穆罕默德·海卡尔著,发恩、黎启译:《萨达特遇刺记》,第322页。

^(四) Hussein Agha Robert Malley “The Arab world was dead In Egypt its reborn”, *The Washington Post*, 13 Feb. 2011.

^⑤ N. Mozes “In Syria Regime Squeekes All Attempts at Protest”, http://www.thanemriblog.org/blog_personal/en/34814.htm, February 23, 2011. (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结语

列宁曾经说过：“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¹在阿拉伯世界，政权脱离民众、发展模式陷入误区、对外依附西方，使这些国家的传统统治模式积弊重重。突尼斯一起偶发的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表明阿拉伯现行统治模式已无法维系下去。突尼斯剧变及网络煽动，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赢得民众，才能赢得政权；一旦脱离多数民众的意愿，政权终将被人民抛弃。

进一步说，当前这场阿拉伯民众的抗议大潮，既是一场自下而上反对当权者的民众革命，同时也是

一次寻求国家复兴之路的新探索。近百年来，阿拉伯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已经尝试了宪政民主、威权政治、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复兴等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和政体形式，但始终未找到富民强国之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乃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缺乏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在作者看来，这主要指辩证唯物主义），尤其缺乏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变革观念。即使是当年政治最先进的纳赛尔政权，奉行的也不过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结果最终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否定之路，进而陷入新的政治更替。这次中东剧变是否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将浴火重生，能够摆脱弱势民主与强人政治交替的历史循环，归根到底，还要看它到底采取何种理论，与哪个阶级结合。○

（责任编辑：马燕冰）

¹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1960年版，第239页。

（接第29页）的“地中海联盟”计划受挫，能源及经贸利益直接受损，潜在的大量难民涌入潮将威胁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从虚的方面讲，欧洲对动荡地区“管还是不管？”的问题并不比美国简单。如果不管，欧洲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将直落谷底，并很可能再难恢复，国际社会将因欧洲对其“大周边”危机不闻不问而更不把欧洲当“大国”；如果要管，欧洲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像管东欧和巴尔干那样有决心，欧洲各国更不可能齐心协力，以一个声音说话。在虚与实两方面，虚的方面可能更严重，它意味着欧洲的“大国”地位越来越虚。

此次北非、中东动荡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冲击利弊兼有，极为复杂。中国在利比亚等动荡国家的投资、商贸、能源利益损失不小，撤侨也要花钱，尤其是大中东动荡引起国际油价攀升，对中国影响更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美欧的关注点被重新拉回大中东地区，其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人权、民主、涉台、涉藏等方面对中国施压的能力和意志削弱，美国尤其不能不放缓其战略东移。不仅如此，无论是稳定中东局势，还是稳定国际油价以及稳定阿以关

系方面，美欧都需要、也可能谋求中国支持。换言之，中东动荡给中国与美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课题。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是中国进一步改善国际战略环境的新机遇。

面对北非、中东动荡，中国再一次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做好损益计算，趋利避害。一方面，中国应适度参与，力促中东动荡国家尽早恢复稳定，并在恢复中东稳定、力避动荡扩散、稳定国际油价等问题上与美欧合作，在中东问题上倡导新型大国合作模式，以在大中东合作助推中国与美欧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此次从动荡国家大规模撤侨、撤资所受损失中接受教益，检讨过去对大中东以至对非洲、拉美的经贸投资政策和外交政策，即检讨“走出去”政策的成败得失，为今后更成功地“走出去”以及为适应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前景，确立切实可行的地缘战略。此外，中国对大中东地区也要有更全面、更系统、更超前的地缘政治思考与安排。○

（责任编辑：沈碧莲等）